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 编

特稿

数字民俗学及其文化传承策略的形成
“文言史”及其研究刍议

董晓萍
刁晏斌

民俗学研究

民间信仰与庙会

——以京西妙峰山春季庙会历史传承考察为个案

民俗学视野中的祖先崇拜

一种民俗学视角的文献研究法

——以《滇南盐法图·白井》为例

拟师和请师：学徒制与“体会”的知识

萧放等
色音

朱霞
彭牧

语法学修辞学研究

上古汉语音变构词中的特指构词

殷周金文虚词研究述要

指代词“这”来源考补

《尚书正义》释“变文”

汉语动词的配价理论及其发展趋势

孙玉文
武振玉
徐时仪
全昱
吕云生

易敏

文字学研究

小篆中的音义型字——兼与音义型古壮字比较

“束”的本义及甲骨文中的束族

刘兴均
王子扬

方言学研究

黎锦熙先生的汉语方言分区方案述评

从《方言》看几组词语的历史更替

项梦冰
吴吉煌

训诂学研究

训诂学理论的当代发展

——陆宗达、王宁先生《训诂方法论》对训诂学理论的贡献

论训诂中的实事求是原则

释“考老”说“转注”

死亡义委婉语文化蕴涵探微——以敦煌愿文为主

佛教词语“五逆”与中土词语“忤逆”的相互转化

杨端志
黎千驹
刘敬林
敏春芳
杨同军

博士生论坛

《东国正韵》的语音系统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中的社会组织民俗

北师大所藏甲骨新缀五则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考——兼论词汇意义系统论的诂经价值

从“遑”看词义和语境的相互制约

《诗经》毛传、郑笺的义理声训

[韩] 李贤善
鞠熙
莫伯峰
孟琢
王诚
刘青松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七辑



商务印书馆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七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七辑/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
文字研究中心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7-100-07305-9

I. ①民… II. ①北… III. ①民俗学—研究—中国
②汉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K892②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203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MÍNSÚ DIǎNJÍ WÉNZÍ YANJIÚ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第七辑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305-9

2010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2½

定价: 40.00 元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学术指导委员会

主 任：董 琨

委 员(音序排列)：

安平秋 郭锡良 何九盈 黄天树 江蓝生 李 强

刘魁立 鲁国尧 王邦维 张 博 赵 诚

主 编：王 宁

副主编：董晓萍

编 务：黄易青

目 录

● 特稿

- 数字民俗学及其文化传承策略的形成 董晓萍 1
“文言史”及其研究刍议 刁晏斌 30

● 民俗学研究

民间信仰与庙会

- 以京西妙峰山春季庙会历史传承考察为个案 萧放 等 57
民俗学视野中的祖先崇拜 色 音 67
一种民俗学视角的文献研究法
——以《滇南盐法图·白井》为例 朱 霞 83
拟师和请师：学徒制与“体会”的知识 彭 牧 96

● 语法学修辞学研究

- 上古汉语音变构词中的特指构词 孙玉文 107
殷周金文虚词研究述要 武振玉 126
指代词“这”来源考补 徐时仪 136
《尚书正义》释“变文” 易敏 全昱 143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吕云生 152

● 文学学研究

- 小篆中的音义型字——兼与音义型古壮字比较 刘兴均 159
“束”的本义及甲骨金文中的束族 王子扬 184

● 方言学研究

- 黎锦熙先生的汉语方言分区方案述评 项梦冰 191
从《方言》看几组词语的历史更替 吴吉煌 215

● 训诂学研究

训诂学理论的当代发展

- 陆宗达、王宁先生《训诂方法论》对训诂学理论的贡献 杨端志 231
- 论训诂中的实事求是原则 黎千驹 243
- 释“考老” 说“转注” 刘敬林 256
- 死亡义委婉语文化蕴涵探微——以敦煌愿文为主 敏春芳 268
- 佛教词语“五逆”与中土词语“忤逆”的相互转化 杨同军 275

● 博士生论坛

- 《东国正韵》的语音系统 [韩]李贤善 281
-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中的社会组织民俗 鞠 熙 298
- 北师大所藏甲骨新缀五则 莫伯峰 314
-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考
- 兼论词汇意义系统论的诂经价值 孟 琢 320
- 从“逞”看词义和语境的相互制约 王 诚 327
- 《诗经》毛传、郑笺的义理声训 刘青松 336
- 英文提要 343

数字民俗学及其文化传承策略的形成^{*}

董晓萍

摘要：数字民俗学探索全球化背景下民俗学跨文化交流的数字化策略，它的目标是促进解决用传统文科方法长期未解决的一些民俗学问题，同时促进人类多元文明共享。本文以数字钟敬文工作站为例，初步讨论这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数字民俗学的选题、民俗学成果输出的理论前提、民俗学专题研究的时空数据库和数字化样本等。

关键词：数字民俗学 钟敬文工作站 跨文化交流

数字民俗学是民俗学与数字信息学交叉研究的新方向。它的形成，是我国高校现代化环境中传统文科研究方法改革的结果^{〔1〕}，目的是适应全球化下各国本土文化输出策略的现代转型也可解决民俗学界长期探索而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对民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出新解释。它的成果形式还能为社会公共教育事业服务，推动人类共享文明成果的积累和传承。近年我和我的科研团队完成“数字民俗文化遗产丛书”，正是一种初期探索成果。本文重点阐述其中的“钟敬文工作站”，对它的文化成果输出理念和形成过程进行讨论。

钟敬文工作站，通过一位民俗学大师对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高校专业教育和社会活动的全面奠基和整体贡献的典范个案，讨论本土人文科学成果在跨文化环境中交流的理念和方法。本站也是钟敬文的个性化数字纪念馆，从大师生平、治学创作、重大社会影响和弟子后续工程中，展现其卓越的历史贡献。我们按照深化专业研究和面向社会传承的共同目标，促进对钟敬文学术文化著述的社会性开发，以现代人所熟悉的介质形式和所使用的互动语言，提供社会应用模型，同时体现民俗学与民俗文化产品相关的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的子课题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7&ZD037，在课题基础研究阶段，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献史纲要》共同进行。

〔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于2000年倡议建立“钟敬文工作站”的实体机构。2006年，在王宁教授的支持下，我们建成“数字钟敬文工作站”。

现代运行规则。

一 数字民俗学的基本选题内容

以钟敬文工作站为例,它的基本选题内容,包括现代民俗学大学遗产的概念内涵、民俗学社会公共教育的要素构成和大师个案的传承样式等,这是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所允许的条件下,民俗学的学科创建及其发展达到高峰期的产物。其研制开发,是在中国步入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阶段后,建设数字信息文化大国,带动人文科学的理念和工具变革的结果。目前国际国内人文成果的保存、利用和传承系统,都已迅速数字化,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在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这是一场精英与日常深度交互的革命,民俗学者一向在精英与日常的关系中选择课题,对这种变化也不能忽视。我们借助数字化的理念与方法,将钟敬文学术文化成就转成数字化的高等教育成果和社会传承模式,尝试实现基础研究与研发产品的统一。

二 民俗学成果输出的前提和策略

现代社会,民俗学重要学术成果的传承和输出要有两个前提:一是对国家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学说,又能为人类共享文明提供新财富;二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普遍文化价值和未来教育价值。钟敬文工作站所要阐述和展陈的内容,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在世界进入全球化的今天,民俗已成为民族文化主权的构成成分,其跨文化交流的性质和遗产保护价值已日益呈现。因此,建设本站的需求也更迫切。

(一) 建立阐述民俗学成果的原创思想、价值和意义的正确文本

对钟敬文学术文化成就进行数字化的转化,根本策略是要准确地阐述钟敬文的原创领域和原创思想。主要有三。

1. 民间文艺学及其原创点

在钟敬文的民俗学理论体系中,民间文艺学是根基。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已开始搜集和整理歌谣、故事,同时开始了相应的理论考察。最初是对民间歌谣,接着是对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相继写成一些随笔和短论。此后,在长期不懈地探索中,形成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说。其原创思想有以下几点。

第一,创造民俗志故事分类法。钟敬文认为,民间文学是主要依靠口头传播的文学,是口头传统中的艺术作品。它在传承过程中,要经历各种不同时代和不同心理的人们的传述和修改。因此,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叙事文学(如故事),在传承中会产生许多异文。为了探究这些异文,出现了“类型”的概念。由于芬兰学派的提倡和传播,以这一概念为核心,形成了一套理论和方法,形成故事类型学。它已广泛流行于各国民俗学界,简称 AT 分类法^{〔2〕}。20 年代后期,钟敬文曾与杨成志合译约瑟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修订的《印度欧罗巴民间故事类型》^{〔3〕},以翻译的形式开启了中国故事类型的研究方向。30 年代初,他就当时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故事资料,按中国民间叙事生态样式,根据中国故事本身的情节结构逻辑,以中文命名习惯,选择中国故事的代表作,草成了 50 多个类型,并由此首创中国民俗志故事分类法。这些故事类型初刊于《开展》月刊的“民俗学专号”,后译载于日本的《民俗学》月刊^{〔4〕}。此后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Nai-tung Ting)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相继出版,^{〔5〕}日本、韩国民俗学界也有相关著作问世。这些国际学者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著作,或者亚洲国家学者研究本国故事类型的著作,都比较详尽,但从时间上说,钟敬文所做的是较早的尝试。已故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教授,晚年在给自己的著作《民俗学》的中译本作序时曾说,他注意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跟阅读了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的日译文有直接关系^{〔6〕}。可见,钟敬文的故事类型的制作,在亚洲民俗学界是有一定影响的。他创造的民俗志故事分类法,迄今还属独步之作。1979 年后,我国开展大规模的故事搜集运动,编纂了覆盖全部省、县的故事集成志书,中国故事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整体呈现出来^{〔7〕}。使用 AT 类型对这些中国故事进行分类和标号,虽可找到共性部分,但有更多的差异部分无法对号,必须根据中国故事本身的逻辑去分类;即使那些能够对号的中国故事,也照样存在多民族差异或地区差异,这些差异都是中国多民族和各地区故事中的文化底线,当地社会的

〔2〕 关于 AT 类型法及其对中国民俗学界的影响,详见拙著《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第 359—368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约瑟雅科布斯修订《印度欧罗巴民间故事类型》,钟敬文、杨成志译,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1928 年。

〔4〕 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原文作于 1929—1931 年间,原载《民俗学集钞》1931 年第 1 辑,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 342—356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年。

〔5〕 [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王燕生、周祖生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李琼、尚孟可、白丁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年。

〔6〕 关敬吾受钟敬文影响而治民间文艺学,参见[日]关敬吾《民俗学》,王汝澜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年。

〔7〕 关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讨论,将另文撰述。

文化生命力和群体情感正在这些底线上积淀和蓄势。对这些中国故事的分类和解释,钟敬文创用的民俗志分类法正好用上。

第二,创建民间文艺学科。钟敬文于1936年提出创建民间文艺学。^{〔8〕}在他看来,对民间文学作品,要从总体性质上去把握,把它建成一门研究口头传统的专业门类。在这个学科门类中,故事类型学只是其中一个分支。他认为,民间文艺学是一门特殊文艺学,主要研究民间文学自身的特点,它既是文学现象,又是民俗现象。在国际学界,从前民间文学虽被不同程度地列入民俗学、人类学或文艺学的对象,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却不大注意民间文艺作品本身具有的特点,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象征制度或文学规律去对待它。在我国,在个别文学史家的著作中,甚至还把它等同于一般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由此造成研究观念的阻滞。钟敬文由于深入这种创作的实践,感到非着重指出它的特点不可。^{〔9〕}自70年代后期始,他针对那些含糊不清的观念,反复做概念上的厘定和原理上的阐释,以唤起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他还指出,对民间文艺学的理解和研究,必须具有相应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些理论上的阐明,对我国民间文艺学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0〕}

第三,创立民间文学代表作研究个案。在浙江执教及日本留学时期,钟敬文已陆续撰写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蛇郎故事试探》、《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和《盘瓠传说考察》等,引起学界关注。^{〔11〕}70年代后期以来,他继续撰写了一些有关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文,其中有关于少数民族传说的,如《刘三姐传说试论》;有关于考古学资料的,如《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有关于世界性神话主题的,如《洪水后兄妹婚再殖人类神话》;有关于中日共同故事

〔8〕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初刊于《艺风》1936年第4卷第1期,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1—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9〕 钟敬文与文学史研究者对待民间文学的不同看法的理论讨论,参见钟敬文《高等学校应该设置“人口口头创作”课》,原文撰于1957年5月6日,初刊于《新建设》1957年第7期,收入《钟敬文教育与文化文存》,第49—54页,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

〔10〕 钟敬文自1979年后对民间文艺学做了很多理论建设工作,参见钟敬文《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原文撰于1979年,初刊于《民间文学》1980年第2期,收入《新的驿程》,第131—148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收入其主编《民间文艺学文丛》,第1—12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2年。

〔11〕 钟敬文《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撰于1932年,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36—7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蛇郎故事试探》撰于1930年,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192—208页。《中国的植物起源神话》撰于1932年,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149—162页。《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撰于1934年,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128—148页。《盘瓠传说考察》撰于1936年,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第101—127页。

比较的,如《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等。^[12]通过这些论文,他确定了中国民间故事代表作的一些名篇,完成了对这些故事的民俗志分类,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研究样本。这些代表作个案所含故事类型有:天鹅处女型、毛衣女型、牛郎织女型、蛇郎型、植物起源型、巧女型、呆女婿型、徐文长型、歌仙型、兄妹婚型、女娲型、灰姑娘型、老鼠嫁女型、田螺娘型、青蛙王子型、老虎外婆型、石狮子型等。当今我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项目,在理论论证和方案制订上多受到钟敬文个案研究的启发,在社会应用中,钟敬文的个案也体现了基础研究的价值。这些个案还探索了东亚国家间的民间文学交流史,尤为日、韩等国的民俗学者所知悉。有的内容也转化为他们的文化保护项目。20世纪60年代前期,钟敬文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还写成了一系列关于晚清时期学者的民间文学观点、理论的论文,^[13]从学术价值上说,这些论文是对中国民间文艺学史领域的开辟;从社会意义上说,也是对钟敬文个案研究的补充,能进一步阐发中国民间故事代表作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应用功能,对后来的故事个案遗产化有相当的启示性。

2. 民俗学及其原创点

钟敬文从20世纪30年代转向专业民俗学研究。80年代以后,他又对民俗学体系结构的问题做了整体思考,发表了《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等系列论文,^[14]使民俗学的体系问题为学者所瞩目,这有利于民俗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民俗学的原创思想上,他主要提出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文化三层说。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其国民文化大都是有层次的。中国古代学者所强调的“雅”与“俗”,“五四”时期学者所常说的“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都是一种对民族文化层次的看法。这是一种二分法,西方学界也有类似的见解。但是,钟敬文根据多年实际观察的结果,提出三分法,即中国文化有上、中、下三个层次。

[12] 钟敬文《刘三姐传说试论》,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第93—1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第121—147页。《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撰于1990年,收入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第220—247页,中华书局,1996年。《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撰于1991年,收入《钟敬文学术著作自选集》,第367—400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第212—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第262—289页。《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收入《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第290—353页。

[14] 钟敬文《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收入《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第138—1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后收入《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第85—142页,中华书局,1996年。

上层文化,指传统社会的贵族、士大夫和附属于他们的知识阶层所拥有和传播的文化,即所谓的经典文化或精英文化。中层文化,指唐宋以来,随着都市的发达,都市的市民、商贾文化及各种附着在都市生活中的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明以来流行的戏曲、小说和时调俗曲等,都属此范围。下层文化,指传统农村的农民、农村和小市镇的手工业工匠等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这三种文化的主人,是社会地位、身份、教养等不同的各类群体,他们的文化,当然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彼此不同,甚至互相碰撞。但这些不同文化的主人,又是生活在同一个大群体(民族、国家)中,他们相互依存,又利害相关(如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因此,他们的文化就不能不有其共同的地方。所谓民族凝聚力,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三者间的文化既有互相差异或抵触的一面,又有互相融合或一致的一面。随便强调哪一点,都是不全面的。^[15] 钟敬文的三分法,比二分细密;也比那些只强调一点的说法要符合事实,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学界的认可。

第二,倡立民俗文化学。钟敬文于1989年提出“民俗文化学”的概念,并提倡把它建成学科。与他的民俗学思想相比,其民俗文化学是将民俗学与文化学交叉建设,从文化的视角延伸和扩展民俗学。而这种文化的对象,不是泛指的文化,而是中国文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钟敬文便着手探讨《山海经》,拟写成一部专著,书名就定为《山海经之文化史的探究》(后因故只完成局部篇章)。他把《山海经》所记载的许多远古信仰、古代科学知识及神话传说等,都看作文化现象,其“民俗文化学”的观点那时已经萌生。后来,随着他对民俗学的不断探索和国内文化学的兴起,这种创建学科的意识更加强烈。他指出,民俗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贴切人民生活的、范围广泛的文化现象。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正如水之于鱼。80年代后期,他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阐明了这种学科成立的基础;此后,又对该学科的学术性质、特点和作用等,做了初步的概括论述。^[16] 在我国,这门学科虽然还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响应者还限于部分学者,但由于它本身成立的根据充足,且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也得到了迅速成长。由此形成三个导向:一是将民俗事象纳入中国文化史研究,加强了对中国历史文献中大量记载的民俗史料的研究,同时补充田野民俗志记录,催生了历史民俗学、民俗文献史和文献民俗志等多个新研究方向,也促成了文献与田野结合的民俗学方法论的形成;二是将民俗学纳入中国整体社会文化框架中研究,在中国上、中、下三层文

[15] 钟敬文最早在1984年赴杭州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中国文学的三层说,后发展为中国文化三层说,参见《谈谈民族的下层文化》,收入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第1—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

[16]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收入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第3—35页,中华书局,1996年。

化的总体观照中,给民俗学再定位,使民俗学研究基层社会文化的优势得到突显;三是将民俗学的应用成果纳入现代国家社会重大文化需求中,在“四世遗”国家政府保护工程中,在相关主流文化事业发展中,发挥民俗学知识体系的作用,学科本身也拥有了把优秀研究成果和民俗杰作遗产化的平台,可以立足本国,探寻丰富人类共享文明的途径。把三个导向归结起来,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让中国民俗学更接近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这对民俗学的现在和未来都是有实质意义的。民俗学于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经过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钟敬文更加坚定了对它“中国化”的自觉性,这是国际思潮和本国社会现实均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90年代末,钟敬文正式提出中国民俗学派的学说,^[17]说明他已经感到水到渠成,也表现了他对学科发展的学术远见。

3. 社会活动成果及其原创点

钟敬文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创建人,大量的社会活动是他的学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他在这方面的实践和原创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始终致力于民俗学机构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前期,钟敬文响应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号召,积极从事对民谣、故事等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又积极加入该会,成为通信会员(因为他当时不在北京)。在中山大学时期,他热情地参加了筹建中国民俗学会的工作,并承担了编辑刊物、丛书和办理民俗学传习班等会务工作。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它的初期学术团体运作和各类活动的组织均与钟敬文密不可分。在杭州时期,钟敬文再度建立中国民俗学会,操办学会的各种活动,对编辑书刊和发展会员等工作莫不尽力。1949年后,钟敬文为了建设这方面的学术机构,执意留在北京,终与周扬等合力建成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被选举为副理事长(郭沫若任理事长),并实际主持工作。由于中央级研究会的建立,全国各省、市也很快成立了分会(或类似分会性质的机构)。这些学术团体,对于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编纂和出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6年以后,钟敬文认为恢复建设民俗学会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亲自草拟了建立新中国民俗学会的倡议书,分别请顾颉刚、杨堃、容肇祖、杨成志和白寿彝诸先生签名,呈交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部门,并于中国文联第四届代表大会中散发倡议书。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恢复成立。钟敬文被公举为理事长,连任四届。在他主持工作的20余年中,出版了民俗研究的会刊,扶助了各省市分会的成立。如今各省、市(自治区)的分会数量已达全国省市(区)总数的2/3以上;有的省、市所辖的地区和县级单位也成立了同类的学术团体。这些机构,大都拥有一定的成员,并致力于地方民俗民间文艺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这些学术机构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全国性民俗文化资料的

[17]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搜集和出版工作,更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二,长期致力于并积极号召对国内民俗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钟敬文从青年时期起,就着力从事民俗资料(主要是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他早年出版了一些民歌集、故事集。在广州和杭州时期,他因为编辑刊物、丛书,从事搜罗民族民间文化文物的活动几乎达到一段高潮。在中山大学后期和香港达德学院时期,他虽然没有亲自去做田野考察,但也不忘利用教课之便,向来自四方的学生进行收集活动。1949年到北京后,他与彭燕郊共同编辑《光明日报》的副刊《民间文艺》周刊,并利用这个机会,征集了不少资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搜集的道路更为广阔,经会内同人整理或协助地方搜集者整理出版的作品集也不少。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俗学会恢复成立,钟敬文等举办了几次民俗学讲习班,他亲自主持演讲,指出资料搜集工作的重要性,并希望学员们做勤恳的搜集者。1984年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部发起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志书集成编纂工作,担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这是一项保存民族民间传承文化的伟大工程,其历史意义决不限于中国,而是亚洲的,乃至世界的。他还在投入这项工作的同时,加强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中青年高级专业人才,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后来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并进行了人才储备。

第三,开创民俗学社会公共教育事业。20世纪30年代,他在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执教,首次为行政专修科学生讲授“民间文学纲要”,后来又为师范科的学生讲授“民间故事研究”。他还在该校的《民众教育季刊》(后改为月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并编辑了一些专号,如《民间文学专号》、《民间艺术专号》、《民间风俗文化专号》及几册“民间文化小丛书”。1949年后,他坚持给各地基层群众文化骨干开展民俗学培训,为我国民俗学社会公共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对钟敬文中国民俗学派学说进行数字化成果转化,建设钟敬文学说的大学遗产,要体现数字化的优势,扩大对大师学术文化成就传承的可能性,提高现代民俗学的传承能力。我们主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在研究和展现中国民俗学派学说体系中,体现民俗学高等教育连续传统的组合方式,从研究传统、教育传统和社会公共服务传统三方面,将钟敬文的全面成就转化为现代大学教育遗产;二是体现钟敬文长期指导的高校学术团队的不中断传承,增加后续专精成果。

(二) 建立社会公共学术新财富

在对钟敬文学术成就进行数字遗产转化的同时,建设民俗学社会公共教育新财富,要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民俗学基础研究与数字化工程的关系。几年来,在钟敬文工作

站的建设中,我们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获得了一些新认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就阐释和展陈钟敬文学术文化贡献的选题项目来说,将其中的有关部分转化为社会公共学术财富,原来并不是近年民俗学和数字化工程的关注点。此前,在高校民俗学圈中,把民俗学的教学科研成果放在象牙塔内,却把民俗学者的文学创作当副业;而在以往文科数字化对象中,已有不少文学名著网站或历代文学名人图书索引,但这又不属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范畴。总之,长期以来,民俗学基础研究和文学文化成果的数字化,各有各的分类归属。然而,这个工作框子不适合于描述拥有多方面学术文化成就的学者,像钟敬文。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民俗学之父,也都既是学术巨匠,又是文学名家,像英国的安得留·朗(Andrew Lang)、芬兰的科隆(Karl Krohn)、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 & Wilhelm Grimm)和日本的柳田国男等,各国各民族的读者群,通过他们的优美文笔,认识了他们的学问;他们也以自己富有理性兼才情的著述,开启了后来无数人走近人文科学公共教育的心智之窗。我们的探索目标,是要开发出民俗学基础研究与数字化工程之间的更多联系,使之可以增加社会公共教育财富的空间。

在钟敬文工作站中,我们根据钟敬文学术文化成就的实际,把以往民俗学和数字化工程各不相干的部分进行整合,把增加社会公共教育财富作为一个新领域进行开拓和充实,向读者介绍一个全面的钟敬文。我们不仅阐述钟敬文的民俗学治绩,也推介他的文学文化成就。这样既能还原他的天才资质,也能还原民俗学与民俗作品密切联系的总体学科形貌。这类社会公共教育人文产品,由于适合现代社会读者的认知习惯,还有利于实现本站面向社会传承的宗旨。

在钟敬文工作站中,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分三类,阐释钟敬文的多面手成就,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积累。

1. 从治学活动中提取公共教育要素

钟敬文民俗学著述丰富、社会活动贡献巨大,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提到“治学活动”这个概念。此处的治学活动,不是民俗学研究本身,也不是纯粹的社会活动,而是民俗学之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的学历教育、进行的专业调查和建立的社会文化网络。钟敬文的治学活动广泛、漫长、富有传奇性,是适用于社会公共教育的精品教本。

钟敬文先生生于晚清,在他那一代文人学者中,大多是“书斋学者”。在学问和社会之间,以学问为主。个人发展依传统背景和兴趣而定,一般不需要另谋机缘。但钟敬文选择了治民俗学,这就需要他自己去谋划发展。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俗学是没有成规的外来学科,连理论根基和社会认同都还相当缺乏,因此对这位中国民俗学的开拓者来说,治学活动,决定了他事业选择的成败,决定了他有无学术阵地,也决定了他的学问成就的结构和社会影响力。钟敬文后来经常在他的著作中叙及个人的治学活动,这也

反映出在他的人生事业中,治学活动正是他自觉的创新内容。大体有四方面。

专业学历教育。20世纪初,钟敬文初涉民俗学时,民俗学的故乡在欧洲,但窗口在日本。他于1934—193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专攻民俗学、文化学和神话学,成为我国第一位专业民俗学者。他在出国前已发表了一些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文章,到日本后,就显得比一般留学生要成熟得多。他在回国前,《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槃瓠神话的考察》、《中国民谣机能试论》和《中国民间传承中的鼠》等研究论文已被译成日文,在当时日本的学术刊物《民族学研究》季刊和《同仁》等月刊上发表。^[18]他还在日本撰写了老獭子故事研究的新论文,向日本神话学界的权威挑战,后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还提出建设“民间文艺学”的思想,^[19]并最终形成我国高校的一门学科。在其治学活动中,留学日本的学习经历是一个高起点,他的国际影响也从留日时期起奠定。

专业调查工作。在民俗学者的治学活动中,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是调查搜集民间文艺资料,钟敬文也不例外。如前所述,他在青年时代已参加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搜集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执教,着力培养新中国的专业调查人才。1979年后,他参与并主持了全国范围内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调查、搜集和编纂工作,带领教研室师生在京郊延庆县做调查,亲身示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90年代后,他沿着北京大学顾颉刚先生60年前调查的踪迹,重上北京西郊妙峰山,完成了生命之旅中最后一次调查。他的调查搜集资料被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和《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等所收入。^[20]他还撰写了一批讨论专业调查原则和学术标准的论文,如《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等。^[21]这些文章对我国高校和社会文化界的民俗学调查活动的组织和水平提升,都起到推动作用。

多学科学者网络。由于长期在北京工作的关系,钟敬文先生与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同行交往较多,也与民俗学相邻学科的学者多所交谊,北京大学东方文化学家季羨林先生、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学家杨荫浏先生和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家罗致平先生和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和民族学家杨堃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古典文化史家启功先生等,他都与之订交多年。他们互赠书刊,互致音

[18]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自序》,第9页,董晓萍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 钟敬文《我与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收入杨哲编《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生涯、学艺自记与学界评述》,第20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20] 钟敬文《钟敬文采录口承故事集》,张振犁编,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

[21] 钟敬文《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原文撰于1980年,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藪》,第317—32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问,互邀讲学,创造了大文科氛围。通过这些活动,他所指导的民俗学专业能与中国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进程保持及时联系和互动关系。

在学术社团中发展。钟敬文青年时代选择民俗学为终生职业,是通过学术社团活动确定的。1927年,他在中山大学执教时,与顾颉刚先生等一道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大学教师组成的民俗学会。以后,他在杭州再建中国民俗学会,“文革”后恢复重建中国民俗学会,都保持了这种大学与社会共建的学术社团格局。学术社团对钟敬文的重要意义有三。一是成为他创建新学科的前奏。他于1950年参与创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后,紧接着开始了新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建设;70年代末,他刚刚恢复工作,就立即投入了新时期中国民俗学会的恢复重建,不久提出建设民俗学的学科体系,随后又倡建民俗文化学。二是成为他社会服务的桥梁。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历次全国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运动,并根据社会实际需求,为社团培养人才,加强社团组织建设,帮助社团积累资料,推动社团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社团一直都很活跃,社会影响广泛,这是与他的社团理念和推进工作分不开的。三是成为他发布和传播学术文化思想的社会渠道。他利用社团所给予他的空间,举办了多种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传习班,同时向各地社团发表工作贺信,阐释他的理论观点。在不同时期,对创建学问与创设社团阵地都给予高度重视。他一方面从事高校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也将它办成社会公共文化事业,使两者互补发展。

2. 从文学创作中提取公共教育内容

钟敬文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民俗学给了他很高的社会影响,文学创作给了他广泛的社会名气。在我国现代史上,许多人听说他的名字,钦敬他的成就,起初都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有一种似为定论的说法是,钟敬文主要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后来放弃了文学,转向民俗学。其实这是不大准确的,他到晚年还在写诗,写散文,出版文学集子。他终其一生都是文学家^[22]。他的文学名作很多,比较重要的有《荔枝小品》、《西湖漫拾》、《西湖散记》、《未来的春》、《战地报告文学集》、《钟敬文散文选集》、《兰窗诗论集》、《履迹心痕》等。^[23] 这些创作,充分展现了他激情澎湃

[22] 我本人在过去的撰文中,根据当时学习钟敬文先生著述的浅见,并参考其他研究钟敬文的文章,也曾持相同说法。但近年我改变了这种观点。我感到,即便是研究有很强反思精神的学者,如钟先生,也不能就资料谈资料,而要进行有距离的分析。

[23] 钟敬文《荔枝小品》,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西湖漫拾》,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西湖散记》,上海明日书店,1930年。《未来的春》,北京言行社,1940年。《钟敬文散文选集》,蔡清富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兰窗诗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履迹心痕》,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